

## 第六章 F. A. 哈耶克与市场自发秩序

### 生平概述

F. A.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Hayek) 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位跨学科的哲学家、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著述丰富，它们在非常广泛的领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是在经济学领域，而且也包括哲学和政治学领域。实际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史中，即将到来的年代无疑可称为“哈耶克时代”。

哈耶克于 1899 年 5 月 8 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和高级公务员家庭，一个重视知识和大学生生活的家庭。然而，年轻时候的哈耶克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活跃的、无组织的思想好奇心使他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各自不同科目上。哈耶克本人坦陈：假如他记笔记，他就不能理解他聆听的内容，并且由于记不住教授们的解释，他不得不费很大的劲重头开始论述他想要表达的观点。正如他在《两种类型的才智之士》(Hayek, 1978c: 50 - 56) 一文中指出的，哈耶克总是把他富有成效的思考能力归功于他明显无组织的和凭直觉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是他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与其他奥地利学派理论家，如庞巴维克和米塞斯的思考方式截然相反，后者对他

们的主题有绝对的掌控，并且能够口头表达出来或者形成非常精确和清晰的文字。

一战结束后，哈耶克从前线（他在那里患过疟疾，也学到些意大利语）回来，他选择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当时那里是学术思潮和讨论的温床，在当时举世无双。（可惜目前还尚未有对战后维也纳这一现象背后原因的精确分析。）有一段时间，哈耶克想着是不是该学习心理学，实际上日后，他出版了一本心理学著作《感觉的秩序》(Hayek, 1952b)，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其中，他奠定了其认识论的基础。然而，哈耶克最终决定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并且在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指导下专攻经济学；维塞尔，我们已经提过，也许是第二代奥地利学派学者中最混乱、也是最折中的一位。

哈耶克本人坦承，他当时的政治观点与其他同学没有明显的区别：他追随他的老师维塞尔，也是个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善意的干预可以改良社会秩序。直到读了米塞斯 1922 年出版的批判性分析《社会主义》之后，哈耶克才抛弃了年轻时代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当时，在维塞尔推荐下，哈耶克开始与米塞斯在职业领域展开紧密的合作，起先是在米塞斯本人领导的“战争赔偿办公室” (War Reparations Office)，而后担任米塞斯创立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研究所的主任。另外，在学术领域，哈耶克成为米塞斯在他维也纳商会办公室每两周举办的经济理论讨论班上最勤勉、最多产的参与者之一。

我们必须强调，哈耶克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研究的起始点都要归功于米塞斯。

正是由于米塞斯，哈耶克抛开了维塞尔多数不良的影响，并且回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根本上来。这一传统由门格尔开创，庞巴维克予以充实，现在则由米塞斯加以支持和捍卫，抵制来自实证主义理论家，如熊彼特，以及那些更倾向于均衡模型的理论家，如维塞尔的错误思想。然而，老师米塞斯和学生哈耶克之间的关

系，某种程度上是奇特的。这种关系中既包含很多的赞赏和尊敬，但两者之间也有疏远的时候，这取决于环境。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表现出某种强调其思想独立的趋势，尽管哈耶克认识到，这位老师的理论随着真实世界的演进一直是有效的。

1931年，哈耶克接受米塞斯的另外一位学生莱昂内尔·罗宾斯的邀请，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49年。从此，哈耶克成为英语世界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一直以来，哈耶克都以对他的所有对手保持最大程度的学术风度而著称，他从不谴责他们的信仰有问题，而只是指出他们的思想错误。例如，在与社会主义理论家、凯恩斯、奈特及其芝加哥学派争论时，虽然他不只反对他们的方法论（哈耶克甚至说，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最危险的书就要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而且也批驳他们的货币、资本和周期理论（Hayek, 1994: 145）；但是哈耶克从没有说出一句抱怨或责备的话，即使是被凯恩斯不公正地猛烈攻击，或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拒之门外——他们的傲慢使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奥地利学派理论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幸运的是，哈耶克最终被接纳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员，尽管没有正式薪水，因为这是由一个私人基金会向他支付的。在那里，他写作了里程碑式的著作《自由宪章》（Hayek, 1990a）。）

哈耶克的私人生活相当不幸。1949年，他决心要与妻子离婚，而和他年轻时的恋人结婚：他的一位表妹。由于一个误解，她已和另外一位男人结了婚。二战后，哈耶克在回维也纳探亲时，再次与她偶遇，那时她已经成为寡妇。哈耶克及其家庭为这一决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英国朋友，以罗宾斯为首，与他绝交，而且离婚的悲痛似乎断送了他第一任妻子的生命（尽管这是个哈耶克及其最亲近者绝不愿意谈论的忌讳话题）。无论如何，直到很多年后，在哈耶克的儿子劳伦斯的婚礼上，他才与罗宾斯和解。也因为如此，哈耶克被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流亡”到

美国。另外，在这些年中，哈耶克遭受了严重的健康问题：首先，新陈代谢问题使他极度瘦弱；其次，听力越来越弱使他在人际交注中成为某种疏远的知识分子；最后，严重的、反复发作的抑郁使他憔悴，并使他很长一段时间思考效率低下。实际上，在《法律、立法和自由》的序言里，哈耶克讲到，有时他甚至想到这些疾病将使他不能完成这本书 (Hayek, 1981: 11)。我们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哈耶克不幸的个人经历促使他相信，道德行为模式对于人类生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然而，哈耶克在研究中对这一主题非同寻常的重视给人一种感觉，即这一方面的思想是出自一位对所讨论的内容有切身体会的人。

当 1974 年，在他的老师米塞斯去世后一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有上述（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健康问题几乎都奇迹般地消失了。在那时，哈耶克感到自己从学术孤立中走了出来，他开始一段不停歇的学术活跃期：周游世界各地，发表演说，完成几部著作。（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是他几乎 90 岁时完成的。）实际上，可以说 1974 年授予哈耶克诺贝尔奖触发了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引人瞩目的复兴，而现在这个复兴正在全世界展开。

哈耶克总是希望避免卷入政治。另外，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生活目标是发现科学真理，他们的角色与政治家——总是必须屈服于公众的要求，以期获得选票——的角色是不兼容的 (Hayek, 1991: 45)。因此，哈耶克认为，从长期看，说服知识分子（因此有了他成功地建立古典自由主义的朝圣山学社）或影响公共舆论将更有效。（哈耶克曾劝阻安东尼·费希尔不要从政，并说服他建立经济事务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阿特拉斯研究基金会，在世界传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如果没有哈耶克这种战略构想，我们很难想像会有公共舆论以及知识界观点的改变，这种改变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在美国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和在英国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

影响，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对哈耶克的宗教观作一个评论，以此来结束这部分内容也许是合适的。尽管小时候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哈耶克在年轻时就放弃了宗教实践，成为一名不可知论者。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越来越理解到宗教对于使人们遵循习俗所起的关键作用，这种习俗遵循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另外，他认识到西班牙黄金年代的神学家的重要性，他们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先驱。在1993年，天主教思想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公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哈耶克（在他1992年去世前）之间的大量个人谈话，让思想界吃了一惊。这个清晰无误的信号表明，哈耶克的思想对教皇的《百年》通谕（*Centesimus Annus*）已经产生的显著影响，特别是第31节和第32节，到处可见哈耶克的思想（Novak, 1993a, 1993b）。我们无从知道，哈耶克，一位公开承认自己为不可知论者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远超出其理解能力的、至高无上的“神人同性的”（anthropomorphic）存在。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哈耶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理解了将人的理性奉为神明的风险，以及宗教在避免这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正如哈耶克在他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句所说的，“这个问题，也许维系着我们文明的存亡”（Hayek, 1990b: 140）。

## 经济周期研究：跨期失调

在学术生涯的前几十年，哈耶克一直致力于周期理论的研究。他遵循了米塞斯的理论指引，但是他自己也作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贡献，实际上，瑞典皇家科学院1974年授予哈耶克诺贝尔奖的原因主要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周期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应该强调，当哈耶克1931年抵达英国时，他的分析工具远优于他英国同事的分析工具，特别是要优于凯恩斯的分析工具。首先，哈耶克掌握了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并完全理解为什么所

谓“节俭悖论”(paradox of thrift)是没有理论意义的。实际上,根据庞巴维克的理论,储蓄的任何增加都将降低消费,从而促使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哈耶克所说的“李嘉图效应”随之而来,表现为对投资品的需求增加,这是真实工资提高的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又是由于储蓄导致的消费品价格下降的结果。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也导致最远离消费阶段的企业家利润的相对增加,因为更为丰裕的储蓄导致利率下降,从而产品的价值提高了。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的结果是生产结构延长,以及变得更为资本密集,因为大量真实储蓄的资源使融资有了可能(Hayek, 1995: 74 - 121)。按哈耶克的说法,当货币被操控时,问题就会以信用扩张的形式出现,这种扩张是银行系统在没有事先储蓄为后盾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它使企业家可以获得新的金融资源,投入到实物投资上,就好像社会的储蓄真的增加了一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样做的结果是投资过程的延长,这是人为压低利率的结果,因此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此,哈耶克着重研究的是货币增长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动(具体地说,是不同阶段的资本品价格以及消费品价格)。而货币数量论只关注货币变动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往往就忽视并遮掩了上述现象。

另外,哈耶克认识到,在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特意出台强有力的信用扩张政策,以缓解当时由于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而导致的“通货紧缩”效应。因此,尽管在这一时期,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没有明显上涨,但是却出现了相当可观的货币扩张,导致形成了相当大的金融泡沫。迟早,这个泡沫将会破灭,严重的投资错误将会显露出来。实际上,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由于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而导致价格下降的环境中,为保持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注定会导致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之间出现严重的跨期失调,这种失调迟早会以经济衰退的形式被反转。哈耶克在他1928年发表的《货币价值中的跨期价格均衡和运动》一文中表达了这些观点(Hayek, 1984: 71 - 118)。哈耶克将这一分析应用到现实环境中,使他能够

预测到1928年10月发生的大萧条，哈耶克把大萧条视做是美联储在这十年间大规模地人为扩张信用的后果（Huerta de Soto, 2006: 424 - 431）。

后来在1931年，哈耶克出版了也许是在周期理论上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书《物价与生产》（Hayek, 1967）。在这本简短而重要的书中，哈耶克详细分析和解释了，没有自愿储蓄的事先增长为后盾的信用扩张如何扭曲生产结构，人为地使之太过于资本密集，并最终在衰退的形式将投资错误显露出来。

实际上，在哈耶克看来，货币变化绝不是中性的，总是会对相对价格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当新的货币以信用的形式被创造出来时，它总是会在某个节点上进入经济系统。起先，货币投到了某些资本品和生产性服务上，后来渐渐地，这种效应扩散到了生产结构的其余部分。这意味着某些价格（那些最远离最终消费阶段的资本品的价格）将在其他价格（最靠近消费品阶段的商品的价格）之前受到影响，这样，在整个生产结构中，资源的分配将发生改变。实际上，银行系统创造新的信用货币，意味着那些原本要承受损失的企业家将会实现赢利，而某些行业中很多原本找不到工作的工人将在这些行业中轻易找到工作。

作为明显的信用扩张和“来得容易的钱”（easy money）的政策的一部分，新货币以人为压低的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水平）而进入经济系统。贴现率的相对下降和信用条件的放松必然导致投资支出相对于消费支出的增加，从而扭曲了指引企业家活动的指标，特别是投资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资本的相对回报率指标。

作为低利率的结果，以前无利可图的投资现在看上去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支出的相对增加，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因此，企业家往往采用更为资本密集的生产方法，并且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同时，消费品产业的相对利润下降，因为在这些产业，成本逐渐爬升，而产品价格却没有上涨。因此，生产要素从最靠近消费的部门向资本最为密集的部门转移。这种转移必然会持

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新近启动的、更为资本密集的生产结构得以投入使用。哈耶克强调，当一部机器的效用取决于对其他互补资本品的生产时，假如由于缺少资源，这些互补的商品不能被生产出来，那么这部机器将变得毫无用处。

然而，银行系统注入到经济系统中的新货币迟早会落入要素所有者的口袋，他们货币收入的增加将会推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没有理由认为，消费者将会明显地改变他们一开始所作的货币收入在当前商品和未来商品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除去经济主体把银行系统创造的所有新货币都存储起来这种假想情况（实践中这是不可能的），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将会普遍提高，这是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导致新的流动货币流入消费品部门所自然出现的结果；而且这也是消费品供应从逻辑上讲暂时性下降的结果，这种下降不仅是因为资源曾经暂时性地从最靠近消费的部门撤出，而且还因为很多资源被用于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期后才会有产出的投资上。

消费品部门相对价格的上涨将反转上述由信用扩张所产生的结果：在最靠近消费的产业，利润开始增长，而投资部门的利润相对来说将下降。那些原本为资本密集型生产结构而生产出来的资本品，现在必须尽可能地转移到不那么资本密集的生产结构（也就是更为劳动密集的结构，因为如果消费品价格上涨总是会导致真实工资下降）。因此，生产要素普遍开始从投资部门向消费品部门转移，最资本密集的部门（如建筑业、造船业、高技术产业、计算机业以及通讯业等）会出现严重的亏损，因为它们只有在低利率的情况下才会赢利，但是现在很显然，这些部门过度扩张了。简而言之，由于缺少足够的真实资源来完成生产结构极其剧烈的改变，经济衰退变得不可避免。这些改变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银行系统人为的信用扩张导致融资变得太过容易。衰退就以投资部门的过度生产和那些靠近消费的部门的生产相对短缺的方式外在地表现出来了。

哈耶克强调，衰退在根本上是由对消费品的相对过度需求所引

发的危机，或者说是由于储蓄的短缺，即储蓄不足以完成错误实施的更为资本密集的投资。这一信用扩张导致的情境就好像在一个荒岛上，居民们着手建造能够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巨大机器，但是在完成这部机器前，他们就耗尽了所有的储蓄和资本，因此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在没有任何资本帮助的情况下，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寻找日常食物。

因此，按哈耶克的说法，衰退时很多生产过程存在“闲置能力”（特别是那些最远离消费的部门，如建筑业、通讯业或计算产业）并不能证明资本过度，或消费不足。相反，这表明我们不能将所有现存的固定资本加以使用，因为对消费品的当前需求是如此紧急，乃至我们不能再“奢侈地”生产必要的流动资本以利用这些闲置能力。

因此，哈耶克得出了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米塞斯的周期分析的必然结论，即货币干预将加深经济主体（投资者和消费者）决策之间的跨期失调，而衰退只不过是健康经济调整的一个阶段。哈耶克解释道，这一阶段不可避免，但是它可以被缓解，只要制止任何后续的信用扩张或人为的消费刺激政策，允许市场力量逐步建立与其参与者的真实欲望更适应的新的生产结构（Huerta de Soto, 2006: 265 - 341）。

以上就是哈耶克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这一分析在他后来的著作《利润、利息和投资》（Hayek, 1939）中最终完成，在其中，他假定存在没有被利用的生产要素。哈耶克对整个分析的逐渐完善，是在他与凯恩斯以及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就货币、资本和周期理论进行辩论的同时进行的。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考察这些争论。

## 与凯恩斯及芝加哥学派的争论

毫不奇怪，从一开始，哈耶克就反对新古典理论家，他们由于缺少合适的资本理论以及不能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转而只

用宏观经济术语来考虑当下的重要问题。

哈耶克坚决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数量论：

我反对货币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因是，所谓“宏观理论”只关注货币数量变动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而不关注对相对价格结构的影响。因此，它往往无视我所认为的通货膨胀的最大危害：引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最终导致的失业。(Hayek, 1978d: 215)

另外，哈耶克重提庞巴维克和克拉克曾经卷入的关于资本概念的争论。在他的著作《资本的纯理论》(Hayek, 1976b)和论文《资本的神话》(Hayek, 1936: 199 - 228)中，哈耶克批评芝加哥学派的创立者弗兰克·奈特，因为奈特坚定支持视资本为可自我复制的、同质的基金的神秘资本概念，从而忽视了构成生产过程的阶段的结构，抹消了企业家选择不断创造、协调和维持这些阶段，或企业家选择不这么做时所起的作用。按哈耶克的说法，奈特的方法非常危险，因为他执著于均衡会最终导致支持一种不正确的消费不足理论，从而间接地支持凯恩斯开出的刺激有效需求的药方，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对社会生产的微观结构所产生的严重扭曲效应。

然而，最重要的争论是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贯穿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全部内容最近已经出版了(Hayek, 1995)。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初刚抵达英国时针对刚出版的凯恩斯的《货币论》撰写了两篇长篇书评，首先展开批评。凯恩斯则对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加以猛烈回击，于是两者之间的辩论开始了，在这场辩论中，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被勾勒了出来。由于如今的凯恩斯主义庞杂反复，我们应该从凯恩斯与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末争论结束的地方开始继续讨论。具体来

说，哈耶克批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方法以及他缺少恰当的资本理论，如庞巴维克所描述的、将生产结构视为一系列阶段的资本理论。哈耶克也批评凯恩斯轻易接受了“消费不足”的神话，以及未能理解，即便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已经下降，也完全有可能以此赢利，只要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品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这样会导致更为资本密集的生产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一旦储蓄有增加，从最靠近消费的阶段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就会转移到最远离消费的阶段，同时劳动力也会随之而来。

另外，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医治大萧条的方法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并且会产生相反的后果。实际上，人为地提高总需求将会严重扭曲生产结构，只会导致就业不稳定。从长期看，由于劳动力被投入到了不能赢利的经济活动当中，甚至会导致更严重的失业。按哈耶克的说法，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开出的财政和货币操控药方，将会严重扭曲市场的跨期协调。因此，哈耶克支持严格的货币本位制度，并反对货币国家化和浮动汇率，而这些正是凯恩斯和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强烈支持的。在另外一本名为《货币国家化和国际稳定》(Hayek, 1971) 的书中，哈耶克表明可变汇率如何引发和导致生产结构的严重扭曲，这种扭曲不可避免地导致固定汇率下不会出现的衰退。哈耶克认为，可变汇率将阻碍市场发挥其协调功能，导致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必要的货币扭曲。

在表 6.1 中，我们列出了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方法与凯恩斯主义及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方法之间的显著区别。

表 6.1 两种经济学方法的对比

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学派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1. 时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时间的影响被忽视
2. “资本”被视为 <b>异质</b> 的资本品集合，它不断地损耗，因此必须 <b>更新</b>	2. 资本被视为 <b>同质</b> 的基金，能够不断地自我复制

续表

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学派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新古典学派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3. 生产过程是 <b>动态的</b> , 被 <b>分割为多级、垂直</b> 的阶段。	3. 处于 <b>均衡状态</b> 的 <b>单维、水平</b> 的生产结构 (收入流量循环)
4. 货币通过调整 <b>相对价格结构</b> 影响过程	4. 货币影响 <b>一般价格水平</b> 。相对价格的改变没有考虑
5. 用 <b>微观经济</b> 因素 (相对价格的变动) 解释宏观经济现象	5. <b>宏观经济总量</b> 的使用阻碍了对背后微观经济现实的分析
6. 奥地利学派经济危机理论关注危机的制度起因, 可以解释为何危机反复发生	6. 缺少一个真正的周期理论, 认为危机的起因来自 <b>外部</b> (心理因素及/或货币政策的错误)
7. 奥地利学派有成熟的 <b>资本理论</b>	7. 缺少一个资本理论
8. <b>储蓄</b> 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导致生产结构的 <b>纵向</b> 变化, 并决定所使用的技术的类型	8. 储蓄 <b>不重要</b> , 资本的生产是 <b>横向的</b> (即是重复的), <b>生产函数</b> 是固定的, 并且取决于技术状况
9. 资本品的需求和消费品的需求之间存在 <b>相反</b> 的关系。所有的投资都需要储蓄, 因此消费会暂时下降	9. 资本品的需求 <b>直接</b> 与消费品的需求相关
10. 生产成本被认为是 <b>主观的</b> , 而不是事先决定的	10. 生产成本是 <b>客观的</b> 、真实的和事先决定的
11. 市场价格决定生产成本, 而不是相反	11. 历史生产成本决定市场价格
12. 利率是由时间偏好的主观评价决定的市场价格。利率用来决定资本品的现值, 这正是资本品市场价格所趋向的。将资本品的预期未来收入流根据利率贴现, 即可求得资本品的现值。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以及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操控导致 (人为的) 繁荣和衰退的周期反复发生	12. 利率取决于资本边际生产力或效率, 通过这一内部贴现率, 资本品的预期收入流将等于生产资本品的历史成本 (这被认为是事先决定的和不变的)。利率被认为在短期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

## 与社会主义者的辩论及对社会工程的批判

从他 1935 年出版关于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论文集《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Hayek, 1975) 开始, 哈耶克就是计划经济经济计算

可能性大辩论中米塞斯一方的一位勤勉而忠实的参与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论文，幸运的是，它们已经结集出版了（Hayek, 1997）。哈耶克的基本思想——为他最后一本书的标题《致命的自负》（Hayek, 1990b）提供了灵感——是，计划经济是思想自傲或科学自大导致的致命错误。在他的著作中，哈耶克的“计划经济”一词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所谓的“现实计划经济”，并且也包括任何通过强制的“社会工程”手段，局部地或全盘地设计或组织构成市场和社会的人类互动网络各方面的系统性企图。哈耶克认为，这种广义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思想谬误，因为任何妄图组织或干预社会的人，在逻辑上不可能产生或得到能使他们实现“改善”社会秩序的主观愿望的信息或知识。实际上，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不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头脑“理性组织”的系统，相反，它是一种自发秩序，也就是说，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是通过成百上千万人之间的连续互动形成的，它不曾被也绝不可能被任何人有意识地设计出来。

正如哈耶克所理解的，社会过程的本质在于（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个人的、实践的、分散的信息或知识，它们是每个人在各自特定的时空情境下，为了实现各自目标而采取行动，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和产生的，这些行动体现在每个人人生旅程的各个阶段当中。人们要想能够创造性地发现和传递那些对当今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言必需的海量实践信息或知识，必须需要能够自由地设定目的，发现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应遭受任何阻挠，特别是系统性的或制度性的强制或暴力。因此，哈耶克视计划经济——无论其类型或程度如何——为思想谬误，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一个试图用制度强制来“改善”或组织社会生活某方面的人，将缺乏大量实践的、分散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分布在成千上万必须服从其命令的人的头脑中。（这种“缺乏”既是源自人有限的理解能力，也是由于这些对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实践知识的数目巨大，以及其隐含的、不可言说的和动态的特征。）另一方面，系统地使用

强制和暴力将阻挠人们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目标，从而也就阻碍了这些目标成为人们发现和产生社会发展和协调所需的实践信息的激励。

哈耶克坚持认为，计划经济是个思想谬误及其逻辑不可能性的理由还在于这一事实，即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制度（道德、法律、语言和经济制度）不可能被任何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而是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成百上千万人一代又一代地贡献出微小的经验、欲望、渴求、知识等，从而导致一些重复性行为规则（制度）的出现，这些规则既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同时又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这些重复性行为规则或具体的行为规则构成了在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物本能与人类理性建构之间的一个中间王国。这是一个中间王国，因为一方面这些规则毫无疑问是源于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们包含了大量的信息、经验和知识，远超出任何单个人的思维或理性能力所及，因而不能被人的思维或理性无中生有地创造、构想或设计出来。

文明涌现所需的行为规则是在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首先建立具有和平、自发交易特性的规则和行为框架（包含财产法的规则和制度框架）的社会群体将逐渐吸收和胜过其他相对更为落后的群体——由于它们更为原始的或部落的结构。因此，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计划经济者认为小型的原始群体（以团结、利他和忠诚原则为基础）所具有的情感和态度，能够足以维持构成现代社会的社会合作的扩展秩序，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实际上，团结和利他原则可以应用于原始群体，因为在这种类型的群体中，每个成员的需要和特点都是相互熟知的。然而，无论怎样试图把部落群体中典型的团结和利他原则推广到其中互不相识的成千上万的个体进行互动和社会合作的扩展秩序，那么结果只会导致文明的消失，大多数人类的灭绝，从而回到部落的、自然经济状态。

哈耶克的新贡献主要在于表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关于计

划经济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思想只不过是社会工程或“建构主义”或“笛卡尔理性主义”逻辑不可能性这个更为一般的原则的一个具体应用。由于这种类型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人的理性能力比实际能力强大得多这个幻觉之上，它反映了致命的“唯科学主义”自负，设想着技术或社会工程的未来应用没有限度。哈耶克用“唯科学主义”一词来指错误地把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中常见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在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名为《科学的反革命》(Hayek, 1952a)。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起源于孔德和圣西门的实证理性主义，以及狭义的边沁功利主义——在其中预设了一个每一个行动的成本和收益都已知，能够进行最大化决策的环境——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分析。不幸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Friedman, 1953)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并且获得了普遍的欢迎，从而重新推动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经济科学中的应用。尽管哈耶克的书大多预料到、回答并批判了弗里德曼那本书中的多数要点，但是哈耶克本人后来还是说：

你知道，我经常在公开场合说的一件事情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是没有对凯恩斯的著作（《通论》）回头进行批评，但是同样令人后悔的是没有批判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同样危险的书。（Hayek, 1994: 145）

上面这些言论可能会使那些把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古典自由主义等同起来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学派的成员和奥地利学派理论家之间存在深刻的方法论差别。在别的地方，哈耶克本人进一步澄清了他与弗里德曼及新古典主义者之间的方法论差别：

弗里德曼是个大实证主义者，他认为除了可经验地证明的

事物之外，在科学论证中是不应该有其他东西的。我的观点是，我们对经济学已经了解得很详细，现在的任务是整理我们的知识。我们不需要任何新的信息。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消化已经知道的东西。统计信息不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只是让我们了解在某个时刻有关特定情境的信息。但在理论上，我不认为统计研究能使我们取得什么成就。……米尔顿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于我和他们每一个的共同之处。……芝加哥学派本质上是用“宏观经济”术语来思考的。他们试图根据总量、平均数、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量等这些统计量来分析。……以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为例，我40年前曾写道，我强烈反对货币数量论，因为它是种将很多因素都排除在外的极其粗糙的方法。一位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高明的人士，竟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初始的方法，而是视做事情的全部，我对此很感到惋惜。因此，我们之间的区别，从根本上说，事实上是方法论问题上的区别。(Hayek, 1993: 129 - 130)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对均衡经济学的批判分析是从20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两篇开创性论文开始的，它们分别是1937年的《经济学和知识》以及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Hayek, 1948)。在这些论文中，哈耶克明确表明了他与新古典社会主义理论家辩论时得出的结论，即他们之所以不能理解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是因为他们所凭借的一般均衡模型假定，所有关于联立方程组的变量和参数的必要信息是“给定的”。哈耶克指出，与经济均衡理论的这种假定相反，在真实生活中，这些信息绝不是给定的，相反，是企业家通过动态过程一步一步地发现和创造出来的，而正是这个动态过程应该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目标。因此，哈耶克自然地抛弃了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概念，而是遵循（起源于经院哲学的）奥地利学派传统，提出一种视为信息发现过程的动

态竞争模式。这一思想见诸他的两篇重要论文：1946年的《竞争的含义》以及1968年的《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Hayek, 1948: 57 - 106; 1978a: 179 - 190; 1981)。

## 法律、立法与自由

1945年，哈耶克离开伦敦经济学院，去了芝加哥大学，这标志着其研究方向的重大变化。实际上，哈耶克从那时开始致力于研究有助于自由社会的法律与制度因素，因此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经济理论上移开了。哈耶克对于20世纪50、60年代中充斥着从“凯恩斯革命”中冒出来的宏观经济概念的理论讨论没有兴趣，他一方面等待着唯科学主义思潮的过去，另一方面他继续进行由卡尔·门格尔开创的有关制度生成及演进的研究。哈耶克此后三十多年的努力，体现在两本至为重要的著作：《自由宪章》(Hayek, 1990a)和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Hayek, 1973, 1978b, 1981)。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把哈耶克在法律和政治理论领域的所有贡献都罗列出来，这个任务已经由其他杰出的哈耶克作品评论家所完成。我们只能指出，哈耶克在经济理论领域及其在法律和政治理论领域的贡献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和统一性。实际上，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是建立在通过一系列的强制命令从而对人的行为进行系统的、制度性的侵害之上，因此它将导致传统的法律概念的消失，这种法律概念被理解为一套具有一般性（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和抽象性（它们只为个体行为建立一个大的框架，而没有对社会过程的任何具体结果进行预测）的规则。这样，实质性法律就被虚假的“法律”所取代，后者是由具体地规定每个人该如何行动的管理命令、规则和命令的集合构成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随着经济干预主义的蔓延和发展，传统的法律就不再作为个体行为的标准，其角色被源于统治主体（无论是否是民主选举的）的强制性命令所取代，哈耶克称后者为“立法”(legislation)，以与一般的“法

律”概念相区分。因此法律失去了它实际运作的空间，而被局限在那些尚未完全陷入干预主义者统治直接影响的领域(不论受管制与否)当中。

同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派生效应出现了：当行为者被剥夺了实质性法律所提供的参考点时，他们就逐渐改变自己的个性，丧失了遵从抽象的、一般性规则的习俗。结果是，他们越来越不接受和服从传统的行动规则。另外，在很多情况下，是否能规避命令实际上是事关生死的问题，而在别的情况下，规避命令反映的是腐败的企业家才能的成功；因此，多数人会把违背规则视为表现他们聪明才智的荣耀，是值得追逐和提倡的，而不认为这是对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规则体系的破坏。简而言之，计划经济鼓励人们违反法律，使其空洞无物、腐败变质，令其在社会层面完全失去信任，导致其彻底失去人们的尊重。

按哈耶克的说法，伴随法律概念的滥用，无一例外地是正义概念和应用的滥用。在传统意义上，正义是指将构成私法和刑法的抽象的、实质性行为规则平等地应用于所有的人。因此，正义女神被描绘为蒙着双眼，因为正义首先必须是“无视”，即在法律应用的过程中，须做到“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15节）。由于计划经济系统地腐蚀了传统的法律概念，它也改变了这个传统的正义概念。实际上，在计划经济制度中，“正义”主要是由统治主体或法官个体的人为评判构成的，这种判断主要建基于他们对特定社会过程的具体“最终结果”或多或少的感性印象，对这一社会过程他们自信能随时把握，并试图通过强制命令自上而下地进行组织。因此，被评判的不再是人的行为本身，而是其在虚假的“正义”背景下被感知的那个“结果”。在“正义”之前加上“社会”作为修饰，对于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来说，显得更有吸引力了。然而从传统法律的视角来看，再也没有比社会正义概念更不公正的了，因为它取决于对社会过程“结果”的看法、印象或估计，而没有从传统法律规则的角度评判每一

个行为者的具体行为如何。

哈耶克强调，在传统的法律中，法官只是履行智力功能；他们不应该受自己情感倾向的影响，也不应该受制于自己关于审判结果对当事双方影响的个人估计。如果像在计划经济中那样，禁止法律的客观应用，而允许根据或多或少的主观的、感性的印象颁布法令，那么法律所有的确定性都将荡然无存。很快行为者将意识到，只要能给法官一个有利的印象，任何诉求都可以得到司法的保护。结果是导致强烈的滥诉冲动，再加上由于错综复杂的强制以及越来越漏洞百出和自相矛盾的命令所产生的混乱状态，法官将不堪重负，他们的工作将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和低效。这个逐渐瓦解的过程最终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与法官名存实亡，法官成了服务于当权者的官僚，只是负责监督他们发布的强制性命令的执行。表 6.2 系统地列出了以企业家才能和人的自由互动为基础的自发过程与建立在命令和制度性强制之上的组织制度之间的主要差别。这张表关注的是这两种进路在法律和正义的概念及应用上的截然相反的作用。

表 6.2 自由、法律及正义的两种不同进路

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自发社会过程 (不受干扰的社会互动)	基于计划经济的社会制度 (系统地、制度性地侵犯企业家才能与人的行为)
1. 由于企业家才能不断发现和消除以利润机会形式出现的社会失调，社会合作自发地产生 (自发秩序)	1. 试图通过当权者的 <b>强制性命令、规定和规章制度</b> ，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协调
2. 社会过程的主角是人，他采取行动和发挥创造性的企业家才能	2. 控制过程的主角是 <b>领导者</b> (不论是否是民主产生) 与 <b>公务员</b> (其行动服从于当权者发布的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
3. 连接社会互动的是 <b>契约</b> ，相关各方根据实质性法律规则 (法律) 交换商品与服务	3. 连接社会互动的是 <b>霸权</b> ；有人发号施令，有人俯着听命。在“社会民主主义”中，“多数人”强制“少数人”

续表

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自发社会过程 (不受干扰的社会互动)	基于计划经济的社会制度 (系统地、制度性地侵犯企业家 才能与人的行为)
4. <b>传统的、实质性的法律，作为抽象的和一般性规则</b> ，占支配地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	4. <b>命令与规章制度</b> 占主导，尽管它们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出现，但它们是个别的、具体的命令，规定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做某种事情，而且没有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
5. 使社会过程得以可能的法律和制度不是被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 <b>习俗中演化</b> 而来的，其中包含很多代人积累的数量巨大的实践经验和信息	5. 命令和规章制度是由 <b>有组织的当权者</b> 有意发布的，是极不完善和不正确的，这是因为当权者相对于市民社会难以消除的无知
6. 自发的过程使 <b>社会和平</b> 具有可能性，因为每一个行为者，在法律的框架内，利用他自己的实践知识，通过与他人和平地合作以及使自己的行为自发地适应其他追求不同目标的人， <b>来追求他自己特定的目标</b>	6. 某个或某组目标是 <b>占支配地位的</b> ，并通过命令体制，强加给所有的人。这导致无法解决的、长时间的社会冲突和暴力，阻碍了社会和平
7. <b>自由</b> 被理解为没有强制或侵犯（制度性的以及非系统性的）	7. “自由”被理解为在任何时刻实现某个具体目标的能力（通过出于意志、命令或突发奇想而采取的行动）
8. 传统的 <b>正义</b> 含义占优势，它表明实质性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而无论社会过程的具体结果是什么。唯一追求的平等是 <b>法律面前人人平等</b> ，司法系统将其付诸实施时，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差别	8. 虚假的“ <b>实质正义</b> ”或“ <b>社会正义</b> ”大行其道；换句话说，追求社会过程 <b>结果的平等</b> ，而无视相关个体的行为（从传统法律的角度看）是对还是错
9. 人与人的关系以 <b>抽象的、经济的、商业</b> 的特性为主导。虚假的忠诚、“团结”和层级等概念不起作用。每个行为者根据实质性法律规则调整其行为，并参与一个 <b>普遍的社会秩序</b> ，在其中，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没有人比较亲近，也没有人比较疏远，而仅仅只是有很多人，其中的多数他并不认识，而和他们交往时，采取的是彼此都满意、影响越来越深远和越来越复杂的方式（“ <b>团结</b> ”一词的正确含义）	9. <b>政治</b> 支配了社会生活，人与人基本的联系方式是“ <b>部落式的</b> ”：（1） <b>忠诚</b> 于群体和头目；（2）尊重层级关系；（3）帮助自己熟悉的“ <b>同胞</b> ”（“ <b>团结</b> ”），淡漠甚至谴责“ <b>其他</b> ”不怎么熟悉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其他“ <b>部落</b> ”的成员，不可信任，是“ <b>敌人</b> ”（“ <b>团结</b> ”一词虚假的和短视的含义）